

前 言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戎马倥偬，文韬武略，可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军事功绩彪炳千秋，军事理论博大精深。但在学习和研究中却发现，邓小平在战役实践中的许多重要贡献至今鲜为人知，更没有全面反映其战役理论与实践的论著。因此，为响应江泽民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号召，很有必要深入研究邓小平战役实践，从理论上系统揭示邓小平战役指导特色。

然而，也许有人会问，邓小平在战争年代主要是搞政治工作，研究和揭示他的战役指导特色有没有实践依据呢？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共同指导了 40 余次战役，而且还独立指导了近 30 次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以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保存红军为目的，以城镇进攻战役为主要样式，先后指导进行了百色地区围歼顽敌战役、回师百色战役等 9 次战役，他是我军早期独立实施战役指导的军事

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以收复敌占领土、创建抗日根据地为目的，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反“扫荡”战役、交通破击战役、反顽战役和城镇进攻战役为主要样式，先后独立指导了磁武涉林战役，太行、太岳 1942 年春季反“扫荡”战役和浮翼战役，以及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指挥各区进行的 10 余次战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坚持“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以运动战战役为主要样式，指导了大别山反“清剿”战役和豫皖边战役中我军路南集团的作战，以及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指导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略性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1977 年 7 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以保卫我国的边境安全和捍卫领土完整为目的，以合同战役为主要样式，先后指导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华北“802”战役演习等，为捍卫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了丰功伟绩。

邓小平不仅具有长期的战役指导实践，而且具有丰富的战役指导理论。在长期实践中，邓小平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先后发表了《七军工作总结》、《迎接一九四一年》、《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关于豫皖边作战方针向军委的报告》、《中原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等涉及战役指导理论的文章、报告近百篇，其中有《关于鄂南战役经过与经验向军委的报

告》、《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等专门反映战役指导理论的杰出之作。另外，仅邓小平亲自拟定的指挥战役作战的电报、命令即有数百件。这些文章、报告、电报等，既涉及到游击战又涉及到运动战与阵地战在战役决策、战役准备、战役用兵、战役战法、战役政治指导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邓小平在理论上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为我军战役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实践中也为我军战役指导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贡献。80年代初期，针对敌人的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中央军委和邓小平认为战争初期我军应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坚决抗击敌人的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我军的战略展开。在战役上，内线采取持久的防御战，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外线要积极捕捉和创造战机，打规模不等的运动战。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局部战争成为对我国的主要威胁，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决定把我军的战略思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建设，自此我军由应付全面战争逐渐向夺取局部战争胜利的方向转化。此后，邓小平提出的许多观点，如人民战争的思想仍然适用于现代作战的观点、现代作战仍要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观点、现代作战要讲究技术的观点、现代作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后勤”的观点、要研究联合作战指挥的观点等，对实施局部战争的战

役指导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不仅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一样具有丰富的战役指导艺术，而且还具有许多独有的特色。战役指导中，邓小平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以人民战争为基础，从我军的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创造性地采取科学的研究战役和指导战役的方法。他能够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共同指导战役；能够把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与灵活创新精神密切结合，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强调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从政治上实施战役指导；善于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始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于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上，以此推动战役的胜利。

综上所述，邓小平不仅是我军著名的政治指挥员，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指导的重要实践者，是当之无愧的战役指挥家，具有丰富的战役指导特色。邓小平战役指导特色是他认识战役和战役指导的基本观点、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深刻体现，是我军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瑰宝，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邓小平战役指导特色，对充实邓小平军事理论，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提高全党、全军对邓小平军事活动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对战役指导的要求将不断提高。研究和学习邓小平战役指导特色，对于全面贯彻我军新时期战略方针，提高我军高中级指挥员特别是政治指挥员实施战役指导的水平，完善我军的战役理论，做好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准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军事生涯为线索，把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事斗争作为大背景，紧紧抓住邓小平在战役指导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与高度的综合、归纳，揭示出了邓小平战役指导的四大特色。

一、积极主动地配合军事主官 实施战役指导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 13 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这两位黄金搭档：一个政委，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一个司令员，其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而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两人相互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共同的革命理想追求，革命思想上的认识一致，革命感情上的异常融洽，使他们结下了一往情深的、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这就为邓小平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充分施展军事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刘伯承实施战役指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在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 2 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的过程中，尽管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导，同时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配合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导了 40 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

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一）坚决维护军事主官的决定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导的实践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重要决定，邓小平都能给予坚决维护和最大限度地紧密配合与支持，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给予坚决支持，并主动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地加以落实。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协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一位在第 129 师工作过的老同志曾经说过，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当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据说在这方面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 1946 年夏天，刘邓率部主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 5 部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 25 部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这是涉及军政、军民关系的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

的。因此，邓小平同志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当然，这种维护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上，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维护刘伯承作出的战役决定上。

也正是由于邓小平能够坚决维护刘伯承对战役作出的决策，使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导中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能始终信心坚定地指挥部队作战。1947年8月下旬，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当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在第6纵队的掩护下进至汝河北岸时，敌情万分紧急：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23日夜幕刚降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此时，河对面的敌人已加强了防守，后面的敌人同我掩护部队即将交火。敌人的企图，是利用汝河水深、没船、无法涉水等形成的天然屏障，拖住刘邓主力，在洪河与汝河之间进行消灭，从而打乱我军进入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局。在这紧急关头，刘邓立即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刘伯承在听完敌情介绍后指出：“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吧？从

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随后，刘伯承命令道：第 18 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第 16 旅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第 17 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立即执行！^①此时，邓小平高声坚定地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②在邓小平看来，当天过不去汝河，将影响到能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指战员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牺牲，才能获得胜利。传达了刘邓首长的命令后，倍受鼓舞的广大指战员，在汝河两岸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刚刚过河的邓小平，为了使部队更为坚定地贯彻刘伯承的命令，使后续部队迅速渡过汝河，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指示还在北岸指挥的张际春：各部门立即将机要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同时，任命穰明德为直属纵队的政治委员，指挥由野战军直属机关和派往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等编成的直属纵队接第 6 纵队后尾过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

^① 参见郝智慧著：《邓小平军事生涯》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 页。

^② 参见任涛著：《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1 页。

战；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带走，免受空袭。就是这样，邓小平不仅坚决维护了刘伯承的决定，而且能够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来落实，表现出一名政治委员应有的积极协作、团结奋进精神。在刘邓的指挥下，到 24 日下午，4 万余人全部渡过汝河，沿着先头部队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终于闯过了跃进大别山的一道险关。在刘邓共同实施战役指导的实践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充分说明了作为政治主官的邓小平，能够以夺取战役胜利的大局为重，把维护军事主官指挥的权威性当做自己的重要任务，从而增强军事主官实施战役指导的力度。

做好各级战役指挥员的工作，将思想统一到军事主官的战役决策上来，以保证战役决策顺利贯彻执行。做好各级战役指挥员的思想工作，是政治主官的职责所在。战役指导中，每当有些指挥员对刘伯承作出的战役决定有看法，思想上难以马上转过弯时，邓小平总是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直到最终将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坚决维护刘伯承所作决定的重要途径之一。贯彻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就是一例。

1947 年 8 月初，在鲁西南战役后，刘邓根据敌情与天候的迅速变化，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提前到 8 月 7 日。定下决心后，刘邓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刘伯承说，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当时，刘邓是这样认为的，大军当面的敌人兵力集中在开封、郑州、徐州及陇海路沿线，敌人的注意力在鲁西南地区，而在陇海路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的防守兵力空虚。况且，当时敌人错误地判断刘邓大军可能因疲劳和洪水而北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如果此时马上结束休整，立即南下，敌人会猝不及防，我军取胜的把握较大。于是，刘伯承根据他们对情况的利弊分析后定下的决心宣布，我决定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就行动，大家对此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 8 月 15 日再开始行动。持这些意见的同志，确实有许多理由。当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刚刚入伍的解放战士至少需要 20 天争取；后方支援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伤员尚未转移。这些问题，确实对部队马上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坚定地接着刘伯承的话说道：“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①。他认为，刘司令员的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

^① 参见任涛著：《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5 页。

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下决心不要后方，向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别山推进，逼向长江，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调敌回援，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扭转全国战局。休会期间，邓小平针对大家的不同看法，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邓小平指出，提前行动，是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战略意图进行坚决贯彻、灵活执行的表现。既可吸引大量敌人，又可粉碎敌水淹我军的阴谋，同时可减轻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压力，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创造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提前行动，会使敌意想不到，可大大减弱部队前进途中的阻力，同时也使敌人使用重兵对我军进行钳形攻击的企图落空，而我军却能赢得时间和空间。提前行动，可调动敌人，将敌我交锋的战场由解放区提前转向敌占区，陕北、山东之敌也可纷纷调出，打乱敌人重点进攻的部署，这样可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通过邓小平深刻地分析说明，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对行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立即行动利大于弊，纷纷表示要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其实，在邓小平的心里还装着立即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是不便于当众给大家说。那就是毛泽东前不久发来的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

困难^①。当时，陕北的敌情很严重，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是没有二话可说了，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马上行动，部队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可邓小平感到同大局相比，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想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当邓小平看到大家在思想上已基本达成一致时，又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广大指战员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在会上，邓小平就战役指导问题指出：“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会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③并指示李达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决心和部署，同时向部队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

就是这样，一个定下决心，一个政治动员；一个进行战役行动部署，一个表示坚决同意与支持，从而把部队战役作战的有关事项，通过两人一来一往的讲述，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股巨大的动力流，传递给广大指挥员，催人去奋进，催人去完成任务，催人去夺取胜利。

^①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参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参见曹应旺主编：《邓小平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二）积极参与战役决策

在实施战役指导的实践中，主动提看法、出主意，积极参与战役决策，是邓小平配合军事主官实施战役指导的重要方式之一。革命战争年代，要夺取战役作战的胜利，正确地实施战役指导是重中之重。邓小平认为，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治指挥员，都应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政治指挥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完善战役决策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军事主官完善战役决策时参考。战场上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战役指导者难以做到完全准确地把握，战役的决策也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关键是战役指导者发现问题后要能够进行及时的修正。在上党战役中，邓小平就能够针对战役的发起时间、兵力部署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使战役决策更为科学，从而表现出邓小平积极参与战役决策的正确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全国上下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可蒋介石借与共产党进行假和谈的时机，从大后方调运大批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武装冲突。1945年8月下旬，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出动重兵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企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发起上党战役，迅速歼灭上党地区的敌人，就成为我党我军能否保卫胜利果实、有力地配合重庆谈判的关键。

8月28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①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主持召开了研究部署上党战役的会议，确定了战役的作战部署。他们决心：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为坚决彻底全部歼灭敌人，打好自卫战争的第一仗，邓小平积极配合刘伯承指导部队进行各项战前准备。战役准备的过程中，邓小平是在涉县赤岸村军区司令部，专门指挥陈再道率领的冀南部队和陈赓率领的太岳部队，向上党地区做向心集结。根据当时部队的情况，经过认真推算和周密考虑后，邓小平感到原战役部署中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他就向位于襄垣的刘伯承致电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估计部队集结时间紧张，提议战役的发起时间最好推迟两天；二是根据各区部队的情况，各区部队的任务区分应是太行部队攻屯留、太岳部队攻长子、冀南部队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可能从壶关窜至长治的敌人；三是待上述三座城市攻克后，最后集中力量会攻长治^②。对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1卷，1961年7月，第21页。

③ 参见曹应旺主编：《邓小平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此，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都表示同意，并决定将战役发起时间由 9 月 8 日推迟到 9 月 10 日。

邓小平的建议，是完全从太行部队、太岳部队和冀南部队的集结时间、集结后的战场态势，以及战役的可能发展出发的。太行部队于 9 月 1 日刚胜利收复襄垣城，只有经过几天时间进行休整后，才能从其休整的襄垣、虎亭地区出发，且该部便于从北向南，向位于较近的屯留城攻击。太岳部队西来，于 9 月 3 日可到达并集结于长子西北、屯留以西的张店地区。从太岳部队集结地区的位置来看，便于向南攻击长子城，向东南切断长子至长治的公路。可冀南部队长途跋涉，按原计划发起攻击，准备时间较为仓促。根据邓小平的计算，冀南部队于 9 月 2 日可到达河北彭城、峰峰以西的贾壁，3 日可到达涉县以东的张家庄，4 日可到达涉县城对岸的河南店，5 日才能到达潞城东北的黎城附近集结。从其集结地区出发，向潞城攻击最为合适。从部队的情况来看，于 8 日发起进攻确实有点紧张，可邓小平所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想到，这是我军夺取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仗，事关大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必须经过充分准备，确实做到万无一失。于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刘伯承等重新研究了决心方案，确定了具体的战役部署。战役于 9 月 10 日发起 历时 1 个月零 3 天，先后共歼敌 3.5 万人，取得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大战役的胜利，除掉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之患，巩固了后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斗争。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建议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对我军夺取上党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挽救战役危局出发，果断提出建议，协助军事主官迅速地作出决策，推动战役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有一个特点，就是战役情况越复杂，情况越紧急，越能够冷静思考，沉着应变。在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战役进行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情况紧急的关头，总是能够做到临危不惧，迅速地向刘伯承提出自己的处置决心，率领部队脱离险境，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夺取战役胜利奠定基础。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在组织部队抢渡淮河时，邓小平就是在紧急关头，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准确分析情况，果断提出建议的。

1947年8月26日刘邓率部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等道道险阻，来到淮河北岸。当时，由于淮河水位忽涨忽落，先头报告河水水急，既不能徒涉，又缺少船只，更不可能架设浮桥，加之敌尾追部队已与我军后卫部队接触，如果不能在27日全部渡过淮河，大军将背水作战。情况极为严重。在这危急的时刻，邓小平经过考虑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抢渡淮河的决策建议。他提议，刘伯承、张际春率司令部先行渡河，指挥已渡河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李达留在淮河边，继续指挥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自己负责断后，组织部队阻击尾追敌